

董志新 著

典故的运用

DIANGUDE
YUNYONG

辽宁教育出版社



典故的运用

董志新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88,000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¹/₈

印数: 1—2,000

1989年8月第1版

1989年8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刘瑞武

责任校对: 马 慧

封面设计: 安 迪

ISBN 7-5382-0763-5/H·18

定价: 1.90元

自序

我从切身的感受中体验到：懂得典故，会用典故，对于治学、写作、工作都有好处。

喜欢用典善于用典是我国文学遗产的一大特色。诸子散文，两汉史著，六朝骈文，隋唐以降的诗词曲赋，都是用典的。越到后来典故越多，用典也就越盛。不懂用典，学习古代文学就有一道关没过好，就读不懂古典文学作品，就不能理解或不能完全理解作者的思想感情。学宋代文学时，曾经读过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的词《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

绿树听鹈鴂，更那堪、鹧鸪声住，
杜鹃声切。啼到春归无寻处，苦恨芳菲
都歇。算未抵、人间离别：马上琵琶关塞
黑，更长门，翠辇辞金阙，看燕燕，送

归妾。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
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
正壮士悲歌未彻。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
清泪长啼血。谁共我，醉明月。

此首词中，辛弃疾连用了几个“人间离别”
的典故：

“马上”句写王昭君出嫁匈奴，在马上弹着
琵琶，边关塞上一片昏黑，回想在汉宫辞别君王
的情景，甚觉凄苦。

“看燕燕”句写卫庄公的妾在儿子被杀后，
被庄公妾送回娘家。去后再不能回来，庄公妾作
了《燕燕》诗。

“将军”句写汉朝将军李陵，兵败被俘，投
降匈奴毁了名声。他的老友——汉使苏武离别匈
奴时，李陵送行。分别后回头看同游的河桥，就
要和老友相隔万里，再不可见了！

“易水”句写荆轲去刺秦王，燕太子在易水
之滨为他送行，众人皆着白服，高渐离击筑，荆
轲和歌，唱出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
不复还”这样悲壮激昂的歌。

据词学家们研究，辛茂嘉当时是滴官到远处
去。满怀报国厚望而得不到重用的辛弃疾，触动
情怀，历举许多去国辞家的离别恨事来为十二弟
送行，寓寓自己深沉的感触和壮志难酬的苦闷。

所用的典故和他当时的实际遭遇、思绪心情是吻合的。难怪近代学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赞许这首词“语语有境界”。

倘若我们不懂用典，不善用典，不知典故，就很难读懂辛弃疾这首词，也无法理解作者那荡气回肠、流泪泣血的思想情感。

懂得用典和“学”有关，而善于用典则和“写”很有关。不会用典，写作也就受到了一定限制。

就拿恢复高考以后的作文题目来说吧：1980年的《读〈画蛋〉有感》，1981年的《读〈毁树容易种树难〉》，1982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三年的作文题目都与典故有关。“画蛋”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画家达·芬奇小时学绘画的轶事；“毁树容易种树难”是出自《韩非子·说林上》和《战国策·魏策二》的一个寓言典故；“先忧后乐”这个词语典故出自北宋大政治家、大文学家范仲淹的名篇《岳阳楼记》。高考的作文命题，连续三年都与典故有关，这不是偶然的巧合吧！我手头有一本书，名叫《高考议论文写作导引》，其中的《议论文题目汇编》中，所例的题目中直接用典故命题的就占20%，这个比例是不低的。比如《莫等闲，白了少年头》、《不以规矩不成方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勿以善小而不为》、《从诸

葛亮健康不佳谈起》，等等。在更多的情况下，典故是作为文章中的材料来使用的，而这里又提了一格，是作为命题立意来使用的。作为学生，不知用典，不会用典，作文时挨憋受罪事小，影响毕业、升学可就事大了。

“会用典”这句话，言之者易，行之者难。我曾经写过一些杂感随笔之类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用的典也不在少数。但用得好的，有点艺术性的，真找不出几个。组织上曾分配我在一家报社编辑理论副刊长达六七年之久，每天接触的文章中，涉及典故的为数很多。用得好的，用得差的，都着实不少。出于干好编辑工作的职业需要，也是出于对个人笔笨手拙的反省，我开始琢磨用典的门径，学习古往今来文论家论述典故运用的理论，借鉴名人高手用典的经验，细心分析时下用典的弊端，偶有所得，志之纸笔，断断续续，竟有三十篇。

这本小册子就是这样产生的。现在整理出来，就教于读者和识者。如果对潜心治学，热心写作的朋友有所帮助，那么就是对作者劳动的最好报酬。

目 录

自序

典故的作用

用典小史·····	(1)
教育作用·····	(6)
论证作用·····	(10)
谋篇作用·····	(15)
修辞作用·····	(21)

典故的积累和选择

典故的积累·····	(26)
典故的选择·····	(30)
典故的角度·····	(34)
选典的眼光·····	(39)

典义辨析

革故鼎新·····	(44)
是是非非·····	(48)

权衡得失·····	(52)
-----------	------

用典艺术

正用与反用·····	(57)
明用与暗用·····	(62)
死用与活用·····	(67)
叙述的技巧·····	(73)

用典欣赏

文学形象增辉 (列宁) ·····	(78)
神话故事出新 (毛泽东) ·····	(82)
焦大屈原巧喻 (鲁迅) ·····	(86)
俚谚鄙语立论 (司马迁) ·····	(90)

用典要求

真实确凿·····	(96)
贴切自然·····	(100)
取事贵约·····	(104)
态度认真·····	(108)
言必己出·····	(113)
文风正派·····	(118)

用典指瑕

文史混淆·····	(123)
盲目引古·····	(128)

典故的作用

用典小史 用典是文章的通用规范——这话首先是《文心雕龙》的作者、南朝梁代文论家刘勰讲的。他说：“明理引乎成辞，征义举乎人事，乃圣贤之鸿谟，经籍之通矩也。”（《文心雕龙·事类》）意思是说，说明某一道理引用现成的话，证明某一意义引用有关事例，是圣贤的大文章，经书的通用规范。这个话不是刘勰随便说的，他是在概括了古往今来的文章都离不开用典这个现象后发的议论。

在中国，文章用典可谓源远流长。近代学者黄侃说：“考经传之文，引成事述故言者，不一而足，即以宣尼大圣（即孔夫子——引者），亲制《易传》、《孝经》，甄采前言，旁征行事；降及百家，其风弥盛；词人有作，援古尤多。”（《文心雕龙札记》）。从黄侃的话里，我们可以窥见中国文人用典的历史。

引言用事，古人一般称为“事类”、“用事”或“使事”、“使故事”等，相当于现代修辞学讲的“引用”。

用典，远在二千五百年前的春秋时期的古代典籍中，已有滥觞。传说周文王推演《周易》一

书，解释卦辞爻辞时曾引用殷高宗征伐鬼方（北方部族）的古典；据《尚书·胤征》载，商王仲康因掌管历法的羲和废弃职守，命胤侯去征讨，胤侯引用先王《政典》上的话说：“先时者杀无赦，不及时者杀无赦”（违反历法农时的杀）。这是关于引事引言的较早的文献记载。春秋晚期，大兵学家孙武子已娴熟地掌握了引用前人论著来说明自己观点的表达方法。如“《军政》曰：‘言不相闻，故为鼓金；视不相见，故为旌旗’”（《军争》），这是述故言；再如“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用间》），这是引成事。与孙武子大致同时代的孔夫子，曾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孔夫子当时周游列国，游说诸侯，常常引证《诗》中的现成句子，以佐证自己的思想观点。他的门人根据他的言行编纂的《论语》一书，保留下不少这样的资料。

战国之初至秦统一，百家争鸣，学派林立，游说时兴，辩士蜂起。各家各派著书立说以宣扬自己的主张，为了说服人而广征博引。那时行人出辞，史官记言，哲人立论，都根注重用典。所谓“降汲百家，其风弥盛”。我们看《左传》、《国语》、《战国策》、《纵横家书》、《庄子》、《孟子》、《韩非子》、《尉繚子》等书，用典之处不胜枚举。

在经学发达的两汉时代，引经据典，蔚然成风。贾谊、晁错那样的大政论散文家，枚乘、司

马相如那样的大辞赋家，王充那样的大思想家，引言用事，自不待言，就是司马迁、班固那样的大史学家，也擅长此道。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笔力雄健，引证丰富，表达高超，技法巧妙，标志着用典的兴盛与成熟。司马迁在《史记》的序赞中，引经据典，看似信手拈来，用得却恰到好处；今日读来，仍然令人叫绝。比如他写《李将军列传赞》，引用了孔夫子“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见《论语·子路》）的遗训，褒扬李广以身率下的风范，又撮用“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谚语，表明广大士众对李广的拥戴。这两个典故，都用得恰到好处，起到了言简意赅的作用。

大概到了汉代，文章的用典已很普遍，此种写作技法趋于成熟。刘勰曾描绘过用典从最初到转为成熟各阶段的状况。他说，战国时屈原和宋玉作诗，用典是“虽引古事，而莫取旧辞”；西汉时的贾谊，司马相如“撮引”旧说只是“万分之一会”（只有极少一部分）；到了东汉的杨雄、刘歆才“酌于《诗》《书》”，“叙于纪传，渐渐综采矣”（渐渐综合采用各书了）；到了崔骃、班固、张衡、蔡邕，采摘经史中的话，使文章写得好象树木布满花果，都成了后来人写作的榜样。（《文心雕龙·事类》）刘勰的描绘，虽然有失准确，但他认为用典有个发展过程，则是和我们今天的看法相吻合的。

先秦两汉，一般都不反对用典。到了南北朝

时，由于散文骈俪化和诗歌的讲求对偶，诗文中使典用事更形繁缛。这时也就出现了“辞不贵奇，竞须新事”，堆砌典故，乱引滥用的弊病，引起了反对。六朝人肖子显对诗歌“缉事比类……全借古语，用申今情”（《文学传论》），提出了异议。南北朝梁代著名文学理论批评家钟嵘，在其文学批评名著《诗品》中，对当时“文章殆同书抄”的现象，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主张使用词语要“自然”，认为诗是“吟咏情性”的，用不着典故装饰，文章用典不是不可以，但是要看清场合，“且表学问”的抄书袋，他是嘲讽的。

诗文写作要不要使事用典，如何运用才恰当？这是南北朝时期文坛上和后来诗文理论常争议和研讨的一个问题。比钟嵘稍早些时候的梁代另一大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设专篇，即《事类》篇讨论用典问题。在中国文论思想史上，《事类》篇是专门讨论这个问题的第一篇文章，是比较全面、系统、深刻的专论。刘勰对用典的作用、地位、原则和要求，都有精辟的论述。刘勰写作此篇的目的，正在于匡正当时文坛用典中的积弊，从而开辟和发展了文论思想中这个新领域。

晋隋以降，唐诗、宋词、元曲，用典相袭成习。关于典故的理论研究，同步发展，时有著述。宋人陈骙的《文则》，元人陈绎曾的《文说》，明人归有光的《文章指南》，明人高琦的

《文章一贯》等著作，或指陈用典利弊，或归纳用典技法，都有可观处。

延至“五四”时期，那些反对文言、提倡白话的人，对于用典也认真反对了一阵子。当年的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中，提出“八不”，其中有一条就是“不用典”。不过平心而论，胡适似乎也不是一般地反对用典，如古人譬喻、成语、史事，引古人作比，引古人语等，“今人亦可用之”；只是反对那种“不知造词，故以此为躲懒藏拙之计”者，特别反对用僻典，用典“泛而不切”。“削刻古典不合文情”，“用典失其原意”诸项。

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引古语往事为吾语之证”的用典优良传统，在“五四”之后不仅被保存下来，而且又有新的发展。鲁迅那雄视千古、文采斐然的杂文，毛泽东那思想深邃、精辟警策的政论，不仅表明他们是文章大师，而且是用典高手。在毛泽东的文论思想中，涉及用典，虽不多见，但偶尔论及，即精妙绝伦，与用典实践交相辉映，足以昭示后人。

用典以增强文章的说服力、感染力，不仅我国的文章家这样做，国外的文章家们也深谙此法。我们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就常常被他们那丰富、贴切、精妙的用典所倾倒。据孟宪强统计，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文学典故就有近五百条。列宁在他的著作中，引用的文学典故、历史典故、哲学典故等，达二千余处。

可不可以这样说，诗文的引言用事，古今一贯，中外一理。刘勰说它是“经籍之通矩”，“经籍”仅指经书，今天看来，这范围要扩大——用典是诗文写作的通用规范。

教育作用 为什么有人在写文章时（尤其是论辩性文章）喜欢引经据典呢？这主要是因为典故具有认识和教育的意义。

典故，作为文献资料，它是古人前人留给我们的思想成果，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反映着人类的知识积累。典故蕴蓄着深刻的历史经验，深邃的哲学道理，是人类智慧和感情的结晶。

在我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已有四五千年，典故也就产生、流传、运用了四五千年。典故是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中，在生产实践中，在社会斗争中，在科学实验中，对客观现实的认识。它是以往生活实践的总结，因此，它又是未来生活实践的教科书。从典故内容的深刻性和丰富性来说，称它为生活的“百科全书”是当之无愧的。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把这句话借用过来，说明典故的认识教育意义是恰到好处的。成功的与失败的、正确的与错误的、光明的与黑暗的、前进的与倒退的、正义的与非理的、美好的与丑恶的……典故都在告诉我们，它是一面能够透视、反映生活的“镜子”。

典故是认识生活（历史的与现实的）的“窗口”。典故的认识作用，是说人们通过典型所展示的历史故事、人物事件、自然规律、生活哲理

等，认识到一定的道理，了解社会生活现实的历史状况，增长多方面的知识。比如，由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需要，出现了“学习热”。人们在探求学习的原则、规律、方法时，自然地联想到古人的学习经验。战国时代思想家荀况《劝学篇》中的典故常常被人们引用借鉴。荀子也确实告诉我们不少学习的规律：“知明而行无过”告诉我们，只有智慧过人，行为才能不出错；“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告诉我们，学习要有耐心，要长期坚持，有毅力才能出成果；“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溪，无以成江海”。告诉我们，要循序渐进，打牢基础，才能登高致远，“抱大金娃娃”；“目不能两视面明，耳不能两听而聪”告诉我们，一心不可二用，学习要专心致志。荀子这些有益的格言，至今仍是我们学习时的明鉴。再比如，现代化建设需要起用大批有才能的新人，人才管理、人才使用、人才培养成为实践中迫切解决的问题，典故中的人才佳话、荐贤故事，给我们提供了历史经验，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春秋时晋国大臣祁黄羊“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的荐才原则，使我们认识到，举荐贤才，要出以公心，为国家社稷着想。刘邦总结自己打天下的经验说，我之所以能取得天下，是因为我重用了象张良、萧何、韩信这样杰出的人才；而项羽所以失掉天下，是他容不得人才，仅有的谋臣范增也被他赶走了，这使我们认识到，人才关系重大，事业成败，惟在得人。唐

太宗的用人之道很重要的一点是“官在得人，不在员多”，宁愿少而精，不愿多而滥，强调官员的精明强干，办事效率要高，这告诉我们，机关不要臃肿重叠，干部宜选出类拔萃之辈，精兵简政，提高干部的质量，才有工作的高效率……可以说，典故能使我们了解的事物，知道的知识，是非常丰富的。大到社会政治生活，小到个人思想品德修养，纵的上下几千年人类所活动的历史，横的左右各个人生所涉及的领域，都解剖给我们看了，使我们能够认识生活与社会的真理，了解历史和现实的情况，增广了见闻、经验和智慧。

典故不仅是人们认识世界的“窗口”，而且是教育人们成长的“老师”。典故能使人认识生活真理，了解时代状况，扩大视野，增长见识，这不仅使人形成或改变现成的政治原则、思想观点、伦理信念，而且使人形成对生活真理的信仰和追求，也就是说这必然引起人的思想感情、理想欲望发生深刻的变化，从而产生一定的倾向性，按照某种信念，为实现某种生活理想而奋斗，这就是典故所产生的教育作用。

典故的教育作用首先取决于它们自身。因为它们所包含的哲理很精辟，很有教育意义，读来发人深思，耐人寻味，使人受到教育。例如“田忌赛马”这个典故，自身就很有教育意义。《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战国时期，齐国的将军田忌常常和王族们赛马，孙臆看到田忌的马从总体上说劣于齐威王，但双方的马力都有上、

中、下三等，于是向田忌献策：用下等马对上等马，用上等马对中等马，用中等马对下等马，结果造成了两个局部的优势和一个局部的劣势。从而，以二比一获胜。孙膑教田忌赛马所体现的军事运筹学思想，不仅在历史上开阔了许许多多军事谋略家们的思想，而且在今天，竟引起不少企业管理者们的兴趣，用其中的哲理，指导自己在市场竞争中站在有利地位。

典故教育作用不仅是久远的，而且是巨大的。明末学者顾炎武“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句饱含爱国深情的名言，曾鼓舞多少炎黄子孙慷慨赴难，御寇抗敌；抗金名将岳飞“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的词句，曾鞭策多少热血青年珍惜光阴，追求事业。战国的时候，秦国的一些大臣建议把来自关东六国的知识分子（“客卿”）通通赶走，这时李斯站起来上书言事，讲了秦国几代君主重用“客卿”开疆立业的历史故事，竟使秦王改变了“逐客”的国策。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在“七大”闭幕词中引用了《列子·汤问》篇著名的寓言故事“愚公移山”，从此，不怕困难与牺牲的愚公精神，成了鼓舞亿万革命人民去夺取胜利的精神力量。当然，不是所有的典故都能发挥长久的巨大的教育作用。但是，典故的教育作用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的。

典故，它们自身就存在一定的认识教育意义，当它们通过文章、文件、各种宣传机器、各种信息载体等媒介物，传播给广大的人民群众，